

# 临邑党史资料

## 第十一集



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三月 日

## 目 录

|                   |                 |
|-------------------|-----------------|
| 关于糖坊党支部的历史考证..... | 宋光华 (1)         |
| 叫卖声传鸿雁语.....      | 刘志民口述 张佩莹执笔 (4) |
| 复官与建议.....        | 刘刚平 (8)         |
| 对往事的片断回忆.....     | 夏彭鉴 (16)        |
| 我在临邑工作的六个春秋.....  | 魏明生 (28)        |
| 谈谈我知道临邑的一点史况..... | 石书金 (39)        |
| 奋战鲁北与支前南下.....    | 李振华 (41)        |
| 春秋只字肃褒贬.....      | 徐行敏 (54)        |
| 李汉元来信摘编.....      | (57)            |

按：宋光华同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县第二任教育局局长于一九八四年在中国人民银行临邑县支行离职休养，随将自己的余热贯注于党史资料征编工作之中。一九八五年春夏交际之时，他撰写了长达七千余字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素材。一九八六年，他为配合全县组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在临邑镇党委的支持下，不仅在糖坊村召开新老党员座谈会，而且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糖坊附近村庄，找知情人调查了解情况，另外还通过信件同现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联系，在索取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亲笔撰成了中共糖坊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史资料，堪称是余热生辉的创举。特载于此集，以收推动我县组织史资料征编活动之社会效益。

### 关于糖坊党支部的历史考证

宋 光 华

一九八六年三月

#### 一 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临邑县糖坊村支部委员会（简称糖坊党支部），是中共临邑县工委于一九三九年二月直接组建的第一个党支部。开终直属中共临邑县工委领导，后直属县委领导，自一九四〇年先后直属区委、乡支委、农村人民公社党委领导。自一九八四年四月，直属中共临邑县临邑镇党委领导，至今已历经四十七个春秋。

糖坊党支部自一九三九年二月建立至一九五五年是糖坊独村支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郭福斋、崔家胡同、双庙、许家、糖坊五个自然村组成糖坊大队党支部。自一九八四年二月又恢复糖坊村支部。四十七年来，糖坊党支部经历了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五个历史时期  
其支部领导成员发生了十五次变化。

## 二 历届党支部领导成员名录

### 抗日战争时期

(1939年2月~1945年8月)

#### 糖坊村党支部

1. 书记 蔡文喜(1939年2月~1940年3月)
2. 书记 宋积明(1940年4月~1940年12月)
3. 书记 蔡志明(1941年1月~1942年2月)
4. 书记 宋光华(1942年3月~1944年8月)
5. 书记 蔡德隆(1944年9月~1945年8月)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 糖坊党支部

6. 书记 宋光申(1945年8月~1947年5月)
7. 书记 董振吉(1947年6月~1949年9月)

###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 糖坊党支部(1956年1月已成为糖坊大队党支部)

8. 书记 王清升(1949年10月~1955年12月)
9. 书记 郭长吉(1956年1月~1957年)
- 副书记 宋光生(1956年1月~1957年)
10. 书记 宋光生(1957年~1963年)
- 副书记 王长禄(1957年~1963年)

11. 书 记 刘 采 海(1963年~1965年5月)

副 书 记 崔 长 明(1963年~1965年5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1976年9月)

糖坊大队党支部

12. 书 记 刘 采 海(1966年5月~1976年9月)

副 书 记 崔 长 明(1966年5月~1976年9月)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1986年10月)

糖坊大队党支部

13. 书 记 刘 采 海(1976年9月~1978年)

副 书 记 崔 长 明(1976年9月~1978年8月)

糖坊大队党支部

14. 书 记 崔 长 明(1978年~1984年2月)

副 书 记 蔡 玉 海(1978年~1984年2月)

糖坊支部

15. 书 记 蔡 玉 海(1984年3月~1986年12月)

注 以后再续着, 如能收进支交名单更好。

刘志明(原名刘明山)同志,系我县孟寺乡官家村人,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该村支部书记且又是不脱产的区委委员。1942年正式入伍。1949年初南下,现是定居于杭州市的离休干部(离休前任杭州市民政局局长)。他十分热忱于家乡党史工作,但因年过花甲,书写困难,于是自己口述,由其贤内助张佩莹同志执笔,书成了珍贵的珍贵史料,开创了夫妇治史的先例,谱写了湖目青山夕照的颂歌。

### 叫卖声传鸿雁语

刘志民口述 张佩莹执笔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

我是临邑县官家庄人。在本村邻居李富河(地下党员,本村学校老师)的启发和帮助下,于一九四〇年(那年我二十一岁)经李富河和梁志超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梁志超同志代表上级党组织把我的组织关系介绍给本村的党支部书记黄成祥同志(后改名为陈精华)。自那以后,我在本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以赶集串乡卖馍馍为职业,顺便秘密地从事党的工作。当时的支部除支部书记是黄成祥外,李富江、官兴福和我是支部委员。尽管有了党的支部,但党员之间在工作中都是单线联系(那时只遇特殊情况开支部会,一般不开党员会)。后来,黄成祥调到区委工作,我接任了村支部书记职务。

我的家乡情况当时是很复杂的。土匪杂团明抢暗夺,日本鬼子不断扫荡,杀人放火横行乡里。真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和发动群众消灭日本侵略者,铲除汉奸土匪恶霸,创立太

平天下，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于是，我遵照上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在群众中开展建党工作。为了方便起见，我首先在亲戚中物色发展对象。离我家八里地的马保庄有我一个表哥，名叫郭本俭（已去逝），他比我大十来岁，在家卖锅饼维生。这个人关心国家大事，并有点活动能力。我就有意识地和他在一起谈论时事形势（他不知道我是党员）。我俩多次谈话后，感到在认识上比较一致，有了共同语言，我就进一步跟他谈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卖国贼的罪恶。郭本俭和许多农民一样吃够了日本鬼子的苦头，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打鬼子他积极拥护，我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本俭入党后，在马保庄他又发展了郭本采等五六名党员，并在他们村建立起党支部。郭本俭担任支部书记，现健在的还有几个，一九八五年我回临邑见到了郭本采等三个同志，他们对那段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到胡六庄去发展党的组织。那里有我一个远房表兄弟张茂玖（已去逝），当年他刚十八岁，是个学生，有点文化，为人老实忠厚，关心国家大事，不愿当亡国奴，积极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这时，我已经是临邑二区区委委员兼本村支部书记。经过交谈，我认为他忠实可靠，便介绍他入了党。刘钟楼村那时只有刘真堂一人是共产党员，梁志超便把刘的党员关系介绍给我，成了我当时在该村建党工作唯一的依靠力量。

当时临邑县二区区委委员有：张健（区委书记）、潘敬先（区长）、李裕林和我。一九四一年潘区长被敌人杀害，李裕林被上级党调去学习后，当时的区委成员是：张健（区委书记）、李耕耘同志任区长，再就是我和客家庄的张茂深同志。当时县委常来指导我们工作的除马

冲同志外，还有李吉祥、张静波同志。

一九四二年环境恶化了。日本鬼子在枣园安了据点，又自齐家庄至孙家屈街挖了一条长长地封锁线。鬼子、伪军疯狂扫荡，我们的活动很困难。区长李耕耘同志带着区中队化整为零隐蔽活动，坚持斗争。其余几个区委委员分散活动，难于见面。党组织考虑到我的安全，决定调我离开到外地工作。一九四二年底我带着十斤粉皮，以串乡叫卖的形式通过了日、伪军的封锁线，到了济阳四区（离家乡二十多里路）找到了临邑县委书记马冲同志。他让我筹建县的秘密交通站，并命我担任站长（实际上站里就是我一人）。我开始住在吕家河涯，以后又迁到绳家河涯（两村之间相隔一条土碱河）。我公开身份是县的一名工作人员，秘密传递区、县之间党的文件。这个时候，马保庄党的工作由二区区委委员张茂深同志负责领导了。我在济阳四区只工作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于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二地委派交通科长崔凤山同志，向我传达了建立地委党内交通站的决定，并把我调到济阳三区担任地委第三交通站站长。自那以后临邑县交通站，因环境恶化而撤销。

冀鲁边区二地委那时分三片活动，设有三个秘密交通中转站（简称中站）。一中站在匡五县（即陵县）境内，二中站在平阳县境内，三中站在济阳三区。我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就在济阳三区地委三中站工作。站里交通员不多，因交通员必须是思想坚定的党员来担任，那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有张好亮同志（现在临邑县城），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志，叫什么名记不住了，大约有二三人，住在王芦家一带。三中站的主要任务是和一中站、二中站保持联系，把部队从鲁西带过来的文件负责转送到一中站、二中站，另外是秘密接送来往

两个副干部。当时 地头的组织部长李平同志直接领导三中队 部队从鲁西带来的文件和信，要迅速转送给有关领导同志 然而敌人封锁得很严，传送信件既困难又不安全 就设法跟我们的部队走，在部队掩护下把文件及时送到一中站和二中队。一九四四年初，我就离开二地委改在新阳三区的 三中队，到济阳南二区工作了。

按：刘刚平同志，事变前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是早期中共临邑县委领导成员，现为杨家杖子矿务局的领导干部。虽年近古稀，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又是支持关心家乡党史工作的热心人。对我们渴求的问题有问必答。自一九八六年六月至今年一月，他给我们写来了三封长信，称得上答议并举的快书。我们以《复言与建议》为题汇编于此集，以期交流共鸣之效。

## 复言与建议

刘刚平

### 临邑党史征委会同志们：

你们寄来的材料和信都已收到，感到很高兴。你们所编的材料很好，但所编材料中也有不少地方和史实有出入。因为有些材料是按口碑资料形成的，再加时间长，年龄大，记忆不全等因素，有出入是可以理解的。我之所以说编的材料中有的有出入，因为我是当时的直接参加者，且又凭我的经历和记忆而提出的。你们都知道，我一九三五年开始接受李一民老师教育。一九三七年五月，又参加了李一民老师组织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一九三八年冀鲁边区总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又派我回故乡，在临、商、济三县的边界区域作开辟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没有离开咱们县，有些问题我较为了解。再者，很多老同志和战友，为了临邑的解放而流血牺牲，英勇献身。我是幸存者，把老同志和战友及先烈们的事迹介绍出来，教育后来人，亦是我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现据来信所提问题回答如下：

### （一）我历史化名问题

我没有化名储国珍，可能关锋同志记错了，临邑县委初成立时，有一个宣传部长叫孙万珍，我们二人是老乡，又是同学，孙万珍入党（一九三八年）是我介绍的。他干了很短时间，就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对抗日失去了信心，经过我党教育，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到济阳伪县政府当了汉奸（大罵关锋同志降了他时职，因当时关发现孙工作消极，生活腐化，叫他做群众工作，干动委会主任，但不参加县委，孙万珍不同意，因而由同我党离心离德又叛变了革命）。我接了孙万珍工作，担任宣传部长。有个储国惠同志，曾在临邑担任过宣传部长，没有储国珍这个人。

### （二）关于刘江明同志曾否被捕的问题

刘江明根本没有被捕这回事。可能有人把李善斋同志被捕的问题错记在刘江明同志身上了。刘江明同志在临邑县担任县委书记时，经常住在张仙白村，郑德时同志（当时县执委宣传部副部长）家。郑的弟弟叫小宝子，是我们的通讯员。郑的大哥有时也给我们传递信件。其次是住在我家或孙安街孙幸燃同志家（孙是由我介绍入党的）。我和刘江明经常见面。当时我是县委副书记，李平同志是二地委组织部长，直接督导临邑的工作。刘江明同志牺牲那一天，在他牺牲前，我和李平及刘江明还在一起，是遇伪军突围时刘江明同志牺牲的，又怎么会出现他在张仙白家被捕的事呢？如果刘江明真的在张仙白村被捕，郑德时、张继孟一定通知我（因为张仙白村离我家很近）。再说，县委书记若被捕一定会震动全县的，我是当时的县委成员之一，我就没有刘江明在张仙白家被捕这个印象。所以我认为可能有人把李善斋被捕的事错记在刘的身上了。

### (三)关于初期几位县委书记的先后序列问题

我记忆马冲以后县委书记的先后序列是 邓林华 刘素 刘江明。因为那时我是县委的头头之一，对当时的情况很熟悉。邓林华排在马冲同志后边，是因为马冲调任县长。这个情况，张继孟（当时的县委成员之一）、李吉祥同志（当时的县委交通员）都可以证明。不过邓林华同志当时在临邑任县委书记，很短时间就调走了。另外，邓林华同志在回忆录中写的情况，也有的和当时的形势不符。我的记忆是这样的：老邓同志他是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临邑工作，一九三五年临邑就开始革命活动，并很活跃。一九三七年民先已经组织起来了，一九三八年我和张继孟等人从边区军政干校回来搞建党工作，因为有过的基础，很快就开展起党的工作开展了。如一区的相坊和张仙白村，另外还有孙家庵、台子刘家村都是我们的活动中心点。这几个村在一九三八年就建立起党的支部来了。还有若干村也建了党支部，并有了党的区委。关于刘景祚同志把入党志愿书都带在身上的事，我与邓林华的记忆不同。刘景祚牺牲时我是县委副书记，从张仙白家走时刘身上只带了一个小笔记本（我活动连个小本也不带），县委开会也没有带党员入党志愿书的，我不带，我也没见刘景祚同志带……

邓林华同志走时我是县委宣传部长，张继孟同志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景祚同志接的邓林华同志，我授张继孟同志任临邑县委副书记兼济阳县工委书记，重点抓济阳工作，张继孟任组织部长。刘在会上发言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刘景祚同志牺牲后，刘江明同志接了临邑县委书记。头一个县委会在临邑三区开的。当时说的什么话音容面目我记得都很清楚。

据上述理由。我可以肯定地说：临邑县委书记继马冲以后的序列应该是 邓林华 刘景祚 刘江明。邓林华离开临邑到平禹工作我们也常见面。谈心。谈经验。

我和李一民同志，孟宪瑞同志常通信，李一民同志来信，他的意见，孙家庵九高，应该写校史。过去商河九个高小，九高是民先革命活动最活跃的一个，是党领导的，县委书记当时是丁润生同志（即抗日战争时三边县委书记赵元明同志，县长王权五），李一民同志是由丁润生同志介绍入党的，他二人是老同学，丁是李平同志老乡、老战友。李一民同志一九三七年五月从老家到九高组织民先，是在丁润生同志指示下干的，也就是说，李一民同志在孙庵九高组织的“民先”即和当时全国其他地方的“民先”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产物，不是孤立的。如要写孙庵九高校史，可以突出李一民、张裁云、赵荫雨三位老师（其中张赵二人成为烈士）。不要突出我，我当时只是一个听指挥的小卒子。咱们县早有党的活动，如据说邓区长（已牺牲）的三弟是共产党员，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但没有在临邑发展起党组织来。可是九高难能可贵建起了“民先”组织，为咱们县党的建设和革命撒下了种子，并向我党我军输送了一批干部，如确定写孙庵九高校史时，请告诉我，以便转告李一民同志。

（四）关于临北工委的部分情况介绍。李明华在临北工作时，班子闹矛盾的问题是李平同志负责处理的。地点是济阳县三区王芦家，是地委组织部机关所在地，也是我活动的基点村。到会的有李明华、李仁、郑队长、地委组织科长许辛光同志。会后李平同志向我介绍处理情况时说，“宋床子（安然）打了李明华好几巴掌，李仁和郑队长

打的最厉害。”不过李平同志那次没提张鉴同志（李平同志说，处理临北工委问题时，张鉴同志未在场——编者注）。事后李明华同志在王芦家办党训班。

后来我见到张鉴同志，我二人谈心时他说：“台子刘家战斗后不久又打了一仗我挂了花，认为这一生完了，很悲观。伤好后，李平同志一个劲的批评，把我降为副部长，我情绪更低落。后来又把我降为区安书记，分配到平昌县，这时我精神振作，积极干起来了。不幸又挂了一次花……。”后来李平同志对我说：“那是个大区，不是降级。”台子刘战斗，当时夏彰鉴未挂花，是宣传部正部长，挂花后没见回临邑县委工作。

（五）临邑县政府成立就有县大队，县长兼大队长，副大队长朱二子，打仗勇敢，回家养病叫汉奸于新岭活埋了。徐尚武县长兼大队长，鲁北支队又派了一个副大队长是老红军，不是党员，台子刘战斗后不久战斗中牺牲。徐县长兼大队长时，先后县大队下属四个分队，第一分队朱二子带来的部分队伍为基础成立的，第二分队聂立达，大胖子，此人双手都能打短枪，打的很准，三分队路虎子，印路有水，第四分队是黑老八，他是孙安乡小孙家村人，是孙老五的警卫员，刺杀孙老五未遂，带出了三十来支枪收到我县大队，不久叛变，到临邑何狗子那里当了汉奸。临邑县大队很能打，群众叫铁军。所以台子刘家战斗以后，徐尚武同志伤好后升为司令员，先后县大队副大队长牺牲了四个。

（六）关于几个区的范围：当时的三区以台子刘为中心，是胡寨一带，二区是原商河六区，是抗日期间归属临邑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

一。原因是民先队员多，党员多，出的干部多，军属多，群众条件最好。因为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有革命活动，不但有李一民、张裁云（女）、赵荫雨等人长期在孙安九高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雨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当时县委书记丁润生同志，是李一民的同学，又是李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民先领导人），李一民同志和张裁云同志又进行组织工作，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实际是共青团），成了在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力量。不但向我军输送了一批新生力量（后来多数成了军队干部）。留在地方的民先队员绝大多数很快的入了党，并不少人成了地方县区干部。二区（商河六区）和济阳四区先后早期成了临邑县的根据地，这是和原有大量“民先”基础分不开的。（李耕耘同志回忆说：为什么二区有那么多村属为我们区小队活动的基地？为什么在环境恶劣时群众也和我们一条心？其原因就在这里。））

（七）关于一区的有关情况。一区主要是指中店子乡和三官庙乡这一带。有一个区小队，是原来小延安支队而改编的。区长是小延安支队指导员，也就是我小时的老师孙兰轩同志。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此我经常跟这区队活动。济阳四区和临邑二区是各一个区长，也经常跟着这个区小队活动，是不能到他管辖区活动的区长。二区邓亦两个区长先后牺牲。济阳四区贾区长妥协不知去向，很长时间没有再派人，只有党的组织，没有政权。五区指的老商河五区，那时它划归临邑县领导。

（八）关于孙安九高情况的补充：《临邑党史资料》第十集，编入了孙安九高的创建情况，我细看了几遍，觉得很好，我顺便作点补

充。首先说明 孙安九高的创始人是孙元吉（孙再恒），不是孙宝树。其次介绍孙安九高的创办概况。孙安村事变前属商河县，且又是处于商河县西南角顶端，位于商河、临邑和济阳三县的分界处。是个偏僻的穷村庄。商河县当时想把一处高小设在六区区公所驻地魏家集。但当时孙家安有两个大学生（孙再恒、孙玉恒兄弟二人）。这两个大学生好似当时的状元。在商河县教育界可以说是说话算数的人物。就运用个教员，孙再恒兄弟二人不点头，别人也干不成。孙再恒得知商河县要在魏家集创办高小的消息后，直接出面，与商河县当局力争。县里同意在孙安创办高小，也就是后来定名的九高。当时为了省钱，就利用原来的一所大庙宇和院地做为建校基地。事成之后，由当时的社会上层名流，组成了筹建组织，但将修建工程包给了孙再恒的五叔孙宝树。待学校建成后，经算账发现孙宝树（既是当时的乡长又是恶棍）有贪污。当时有一个叫李世聪的教师，带领一伙人到商河县台友孙宝树。商河县教育局长（不是县长）前来查处此案。当时把原、被告、校长召集在一起。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了那次活动。折腾了半天，也没弄出什么眉目，教育局长作出调解词，令孙宝树修个纪念碑了结此事，因孙宝树拒绝不欢而散。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姓邸，和李一民同志是表兄弟（当时李不在场，正在曲阜读书）。第二任校长丁万廷。赵荫雨是东北流亡入关的青年学生，来孙安九高当了教师，还有个姓秋的教师，讲课很好，他回沾化县没再回校。后听说他是共产党员，因回家暴露了身份，所以未再来任教。这期间，有一次学生罢课，被校方开除了两个学生（马云桥和张国泽）。不过因学生罢课一事，那位邸校长被调往三高。自此换了丁万廷校长。一九三五年李一民来

校任教（一年就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又来了一位张裁云（女）老师，从九高回到沾化县以后担任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听说以后遇难牺牲。正因为该校有几位老师是进步的，我也受不此进步思想的陶冶。

党史资料中，还有欠推敲核实的地方。我考虑不是主要的问题，没作一一更正。如果你们初成党史草稿后，来人当面对证或我回去参修都行。你们寄我一本找参谋参谋也可。无论用那种方式，我乐意为家乡党史的修审工作贡献力量。

我建议，应及早开个党史工作座谈会。我们已是年近古稀，快见马克思的人了（今年我局就有几个老领导干部辞世，邓林华不是死了吗？）所以，我提议还是早点开个座谈会好。只要把马冲同志请了来，我和张继孟等人参加。座谈三至五天就会把我们了解的情况弄清楚了。因为我和马冲、张继孟三个人都是临邑人，而且又共同在当时的中共临邑县委先后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我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四年没离开临邑，不是临商公路北边，就是在临商公路南边，凡正是围着临邑转。我现在身体好，记忆力较强，互相启发，容易把当时的基本情况说清楚。对那些现在县附近又了解情况的同志，视实际情况到时请他们参加座谈就行了。不过要尽量开短小精干的会。你们有了这些年的基础，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精神，拟出个座谈提纲，这样有针对性的提，针对性的答，效果会好一些。总之，对我们这些人脑子里的材料应抓紧抢，否则，错过时机，关键性人不在世了，你们再搜集就困难了。考虑到马冲同志身体，明年春天四、五月为宜，我个人什么时候都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来信、来人咨询都行。我一定尽力而写。请向李平、马冲、张继孟等老同志问好，我很想念他们。